

# 我国中小学海洋教育起源探析

马勇<sup>1</sup>, 刘凯<sup>2</sup>

(1. 中国海洋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 山东 青岛 266100;

2. 中国海洋大学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我国中小学海洋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变革先决条件。追根溯源,其产生主要有三条线索与路径,即起源于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清末洋务派所创办的新式学堂以及民国初年的中小学。萌发状态的海洋教育活动大多体现在地理课程与教学中,包括教材编撰、课程内容安排及具体活动。从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到晚清新式学堂,再到民国初期的中小学,海洋教育因素与内容逐渐增加与丰富,它们是中小学海洋教育的源头活水。

**关键词:** 中小学; 海洋教育; 地理课程; 起源

**中图分类号:** G4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627 (2020) 02-0024-07

根据海洋教育的定义与范畴<sup>[1]</sup>,海洋教育可以分为海洋普通教育、海洋职业教育与海洋成人教育;根据受众的不同,海洋教育可分为学校海洋教育与社会海洋教育。中小学海洋教育既可归为海洋普通教育,也可归为学校海洋教育。本文仅就中小学海洋教育的起源作一探讨。我们认为,中小学海洋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变革先决条件。追根溯源,我国萌芽状态的中小学海洋教育可以追溯到晚清与民国初年,因此,它不是一个确切的年月日时间,而是一个特殊时期或时间段。根据初步的资料分析与研究,我国中小学海洋教育的产生主要有三条线索,即源起于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清末洋务派所办的新式学校以及民国初年的中小学。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中国社会与教育并无海洋教育的概念与意识。因此,在今天看来当时所产生的海洋教育活动,都显现在、渗入到学校教育课程中零零星星的海洋教育内容或因素,其中大多出现在中小学的地理课教学

中。以下对其产生的社会变迁背景与产生的样式、形态作一探析。

## 一、教会学校中孕育而生的海洋教育因素

1848年鸦片战争以后,一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西方列强获得了在中国的诸多特权,其中包含了在中国传教与兴办学校的权利。西方传教士的主要任务是传经布道,这与国人的传统、习俗与宗教格格不入,在初始的传经受阻后,西方传教士利用国人重视子女教育的传统文化与心理,采用办学的方式与手段来曲线传教,故一大批教会学校产生。近代中国教会学校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起步阶段,即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第一所教会学校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于1818年在南洋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1842年迁到香港。美国传教士布

收稿日期: 2019-10-21

第一作者简介: 马勇(1965-),男,山东泗水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高教理论与管理、海洋教育。

E-mail: mayong@ouc.edu.cn

朗为纪念马礼逊的创校，于1839年在广州开设马礼逊学堂，这是两所最早创设的教会学校。其后，传教士又陆续创办学校，如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开设的崇信义塾与上海的清心书院，美国公理会在福州开办的格致书院，英国圣公会在上海开设的英华书院等。早期教会学校的学生以贫民子女为主，学校规模小，每所学校在校生多在几人至几十人之间，受教育的层次处于小学水平。从1842年至1877年“全国基督教学校仅有350所，学生也只有5975人。”<sup>[2]</sup>

第二阶段是发展期，即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戊戌变法。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允许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活动，教会学校也随之迅速增加。这一阶段许多国人学习西方科学与文明渐成潮流，为了适应这一需要，传教士主动转换教育模式，减少宗教内容，增加西学内容，扩大教育对象，调整培养目标。因此，教会学校得以迅速发展。到1899年，“教会学校增加到2000所左右，学生达4万人。”<sup>[2]</sup>

第三阶段为成熟期，即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科举制的废除、近代学制的建立、新式学校的大量出现，特别是中华民国的成立，都为教会学校的大发展提供了好的契机。其主要特点是办学的世俗化与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教学内容不断转化为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为主，并实行分科教学，学生的入学与毕业需经过严格的考试选拔与甄别。此外，教会学校的教师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大量的专业教育人员进入教会学校。据统计到1918年，“在华教会学校大约有13000所，学生总数达35万余人，比1900年增加4倍左右。”<sup>[2]</sup>需要强调的是，这一阶段教会大学得以迅速发展，形成一个独立的教会大学体系，其办学水平足以与中国自办大学相抗衡，且互相影响与促进。

如何看待与挖掘教会学校办学过程中孕育而生的海洋教育因素，这要深入其里，考察其教学体系，特别是其课程体系。

第一所教会学校具有始发意义。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在广州开设一所小学，后迁往澳

门，为纪念马礼逊而改名为马礼逊学堂。这所学堂是最早设立于中国本土的较为正式的中小学水平的教会学校。该校分别设置中文和英文课程，“英文课程主要有天文学、历史、地理、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化学、音乐、作文等科目。”<sup>[4]</sup>其中，地理课采用英国教科书的内容，涉及到世界地理、多个国家介绍以及国家之间海与洋的连接。据此可以认为，这是在中国的教会学校最早讲授海洋知识的教育活动。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会员埃尔德赛（Aldersay）在宁波创办宁波女塾，这是外国人在中国内陆建立女子学校的开端。该校实行了免费的教育，学生衣食由学校提供，“开设的课程有识字、基督故事、数学、地理与女红等。”<sup>[5]</sup>1860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在上海创办了清心书院，初始以宗教课程为主，兼设国文、天文、地理、格物、算术等，该校后改为实业学校。186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山东登州创办教会小学“蒙养学堂”，从1873开始又增设了中学课程，1876年正式改名为文会馆。文会馆的学制分为备斋三年，正斋六年，备斋是小学程度，正斋是中学程度。“其课程有圣经、天道溯源、四书、五经、数学、格物、地石学、测绘、富国策、万国通鉴等。”<sup>[5]</sup>这些地理、地石学、测绘、万国通鉴等课程都渗入了海洋知识的教学内容。上海格致书院是我国近代第一所学习自然科学技术的教会学校。王韬于1885年出任山长（即监院）后，为了扩大书院的影响，把研习西学的风气推广到各地，从1886年起，格致书院举行课考。王韬还聘请李鸿章、曾国荃、刘坤一、薛福成、郑观应、盛宣怀等洋务大员或对西方世界有较多了解的官员士绅们命题、阅卷、评定等次。考试的命题主要围绕科学与时事，比如聂缉槩、刘坤一就曾给出地学方面的命题：“大海洋、大西洋海、印度洋、北冰洋、南冰洋考；潮汐应月说等。”<sup>[6]</sup>这些命题涉及大海洋等相关内容，说明在当时的授课内容中涉及到了这几个大洋的内容，并对学书进行了相关的考试检测。

对此，有以下两点具体的分析。

第一,教会学校的海洋教育内容包含于其自然科学课程体系中。从各个教会学校的教学计划看,自然科学课程具有较高的比重,数理化是主科,还开设天文、地理学、航海测量以及动、植物等课程。这改变了以往中国的传统课程,下面从上海中西书院的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到这种突破。根据《万国公报》第14年第666卷的资料可知,中西书院八年的课程安排中,第一年主要是识字教育,对辞句的注解等;第二年对较为简单的书目进行讲解,同时学习外国语;通过两年的基础学习,从第三年开始,进行数学启蒙教学,同时学习各国地图,对各国地理有简单的了解;第四年开始学习代数学;第五年学习天文历法知识,以及勾股法则、平三角、弧三角等数学知识;第六年学习化学、重学、微分等较深层次的科学知识。六年期满后,如愿意继续深造则可进行第七年和第八年的学业,第七年主要学习航海测量、万国公法等课程;而第八年则学习天文测量、地学、金石考究等内容。

由此可见,该校在课程与教学中进行了大量的海洋知识的渗透,其中在第三年、第七年与第八年开设的“各国地图”“航海测量”“天文测量地学”课程尤为明显。

第二,教会学校的海洋教育活动蕴含在教材的编写与使用中。教材是教学工作的依托,是学校教学内容的重要体现。因此,传教士在办学中便重视教材的编撰与出版。

首先是自行编译。早期的教会学校,较为普遍缺乏适用教材,往往采取编译西方教材的方式为其所用。马礼逊学堂所用的教科书主要有“中国文选、数学、地理、博物、建筑、商务等”<sup>[5]</sup>,这些教材由教会所办的广州“益智会”于1839年出版。1885年格致书院采用了由传教士翻译的英国图书馆出版的课本,主要有英语、算学、地理及文艺等,在其附设的学塾中教授和使用。

其次,由1877年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成立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译出版的教科书。成立初期,委员会决定编写初、高级两套教材。“这两套教材主要涉及天文学、测量学等自然科学类、宗教历史类、声乐绘画类、动植物类以及地

理类等科目类型。其中与地理相关的科目包括地质学、矿物学、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宗教与自然史等。同时还包括一套学校地图和一套动植物图表,以供张贴学习。”<sup>[7]</sup>该批教科书于1878年7月出版并投入使用,到1890年10多年间,共计出版书籍50种、74册,图表40幅,仅地理类的图书就5种5册,其中渗入了大量的海洋教育内容。

再之,由“中华教育会”编译的教科书。中华教育会(The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China)是由基督教学校教科书委员演变而来的,于1890年成立。该会会长为狄考文,一些在教会学校任职的传教士成为会员。该会的职责主要有:一是编选教材;二是实现教学上的互动与互助;三是研究与寻找中国教育问题。

中华教育会成立伊始,便进行教材编译与出版工作。教材的基本概念、术语与词汇主要由中华教育会的人员负责审核。由狄考文来整理、编订数学类及航海、天文、水等知识领域的名词、术语与概念;由傅兰雅承担收集化学、气象、工程学、造船、矿物学、采矿等方面的技术名词与术语;李安德主要负责收集地学、法学、神学等领域的名词与概念;潘慎文负责编制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等方面的名词与术语。自1890年开始的3年间,中华教育会先后“出版了动力学、水力学、光学、热学、地学等领域的教材达12种,如H·金曼和李安德的《蔡平先生的政治地理学》;李安德的《政治地理学入门》《物理地理学》《心算》;潘慎文夫人的《动物学和自然历史》;J·惠志德的《自然神学》。”<sup>[5]</sup>与此相应,另外经筛选,又编选了一批过去使用的教材。这批教科书的出版与使用对当时中国封建传统的经学教材系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和突破,其中一个亮点是引入了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技术。此外,传教士编译与出版的很多教材,名词与术语较为一致,内容简洁,线条明快,由浅入深,层层递进,辅以插图和练习,易于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对此,应给以客观的评价。

总之,西方传教士编撰的多类别教材中,地理类、航海测绘类占了很大的比重,它们应用于

教育教学过程,课程中渗入了海洋知识的教学与传播,由此可以初步归纳,教会学校的地理课程与其他相关课程的教学活动应是我国中小学海洋教育萌发的一条路径和源头。

## 二、晚清新式学校教育中萌生的海洋教育内容

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经世派思想家先后提出了“悉夷”“师夷”“制夷”的思想。林则徐在广州办理洋务时,为了解外国的信息,派人翻译国外的图书报纸等,编成《四洲志》。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100卷的《海国图志》,全面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与文化,并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主张经世致用,可师、学以前曾被人当作奇技淫巧的西方科学知识。1867年,王韬在英国游历时发现“英国重视天文、地理、电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学习,并不崇尚辞赋文章”<sup>[8]</sup>,这给他造成了极大的触动。因此,他主张学习西方的教育内容,借鉴西方的教育方式,从而改变中国的教育模式。到19世纪后期,朝野上下已经形成变革时局,要求仿效西方的思潮。最为典型的做法是康有为在1898年5月的公车上书,他向光绪帝推荐与效仿西式教育,推崇欧美各国的“应用与实用之学”。为此,他提出了关于学校体系的构想,主张“在乡设立小学,7岁以上儿童必须入学,学习文史、算数、地理、物理、歌乐,学业年限为8年。在县设立中学,儿童14岁入学,除了设置小学阶段的科目外,还学习外国语,重视实用学科。在省、府设立专门高等学校或大学,如设立海、陆、医、律、师范各专门学校”<sup>[9]</sup>。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不仅主张师夷之长,而且认为要废科举,建新校,培养适用与实用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860年代始,新教学内容涌入我国学校则势不可当。

在新式学校中最早设置地理课应是始于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该馆在1876年制定了持续八个年级的课程体系,有关地理教育的内

容涉及海洋知识。如其在第三年讲解各国地图,在第七年学习天文测算和万国公法,在第八年讲授地理金石,这些课程都属于地理学的内容,涉及海洋知识。京师同文馆的设立客观上对晚晴的政治、外交、学术、教育等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63年,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仿效京师同文馆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广方言馆的学生分为上下班,“初进馆者先在下班,学习外国公理公法,如算学、对数学、几何学、重学、天文、地理、绘图等事,皆用初学浅书教习。”<sup>[6]</sup>下班学习完成后,通过考试,选择较为优秀的学生进入上班学习。广方言馆官方来往的一个叫做“计呈酌拟广方言馆课程十条”的文件中提到:“上班分七门:一、辨察地产,分炼各金,以备制造之材料;二、选用各金材料,或铸或打,以成机器;三、制造或木或铁各种;四、拟定各汽机图样或司机各事;五、行海理法;六、水陆攻战;七、外国语言文字,风俗国政。”<sup>[9]</sup>由此可见,广方言馆上班的七门课程中,“辨查地产”涉及地质学的内容,而“行海理法”与“水陆攻战”则说明当时广方言馆已经开始讲授关于海洋地理学的相关知识。

1878年,张焕纶首创私人办学性质的新式学校——上海正蒙书院,该校废弃传统书院的帖括制义等课程,开设舆地、格致、数学等新式课程,其中舆地便是地理。再后的1895年,包括盛宣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在内的许多新式学堂都重视地理课程的设置,加强对学生的地理教育。正如190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英地理问答》序中写道:“此地理学一门泰西所以视为要务也。西童于冲龄负笈时,即授以地志山经,俾自幼习知世故,藉长学识,颇属意美法良。惟华人于坤舆一道,类多略而不讲,致浅陋迂拘,卒胎坐井观天之诮。”<sup>[8]</sup>新式学堂中地理课程的广泛开设,催生并形成提高国人地理视野和素质的思想与价值取向。新式学堂中虽都设立了地理相关的课程,但都是创建者基于自身认识或出于当时当地社会发展的需要自行设立的,并无明确的规范,所用教材也不统一。清末建立的一系列新式学堂顺应了时代潮流,培养了更多的适应当

时国情的多方面人才。而伴随着甲午战败及《辛丑条约》的签订,变法呼声日益高涨。在朝野内外强大改革压力下,清政府推行所谓“新政”,其主要内容就是实行教育改革。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学制系统。该章程明文规定在学校开设地理课,标志着近代中小学地理教育终于正式诞生。

“癸卯学制”对中小学地理教育的宗旨、教学内容、课时安排等都做了具体安排<sup>[10]</sup>,从中可看到中小学地理课中渗入的海洋教育因素与内容的基本情况。

第一,指出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三教育段地理科目的教育目的与要求。以下依次为:

(1) 初等小学堂地理教育目标:“让学生知晓中国疆域的大致情况,认识世界五大洲的地图,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的爱国之心;同时,应优先讲解与本地有关的地理知识,从而培养其爱乡土之心。章程中还强调了地理教学中运用地图的重要性,即“地理宜悬本县图、本省图、中国图、东西半球图、五洲图于壁上,每学生各与折迭善图一张,则不烦细讲而自了然。”<sup>[8]</sup>

(2) 高等小学堂地理教育目标:“知晓地球之上人类生计情况,着重了解中国的地域分布,从而培养爱国之心;此外,还需了解不同地理类型及各种地质材料的作用,各大洋与大洲之间的联系区别,不同国家和人种之间的区别,等。”<sup>[11]</sup>

(3) 中学堂地理教育目标:“首先讲总的地理概况,其次具体到中国的地理情况;使学生了解地表、气候、人种的分布及各地人民生计的情况。再次,讲外国地理,使学生了解五大洲各国的地理情况。同时要讲解地球与人类、地球与天体的关系,了解地球结构与陆海气象的基本情况。”<sup>[11]</sup>

第二,区分出地理教育教学内容与相应的课时安排。

初等小学堂的地理课程,第一、二年先讲授本学校所在地方的行政建制、附近山水分布以及

本地先贤的祠堂宗庙情况,以培养学生爱乡土之心。第三年内容扩展至本县、本府、本省的地理情况,进而对全国的地理分布有大致的了解。第四年开始讲授全国的疆域面积、人口情况以及山川河流等基本地理内容。第五年的内容由中国本土扩展至与中国毗连的邻国地理位置、都会分布等。内容由小及大,由浅就深,主要通过对本地区、本国及相邻各国的地理知识的了解,建立起爱乡爱国之心。到高等小学堂阶段,除了学习本国地理知识外,还要系统学习国外的地理知识。

中学堂阶段,总共5年的课程安排中,第一年对全球地理、亚洲地理及中国地理进行总体介绍。第二年时专学中国地理,第三、四年专学外国地理。亚洲地理及外国地理的内容中,涉及大洲大洋等海洋知识。第五年讲授地文学,即地形的形成及特征、地理的水陆形态等。课时安排上,“初小学堂每周共30课时,地理占1课时;高小学堂每周安排36课时,地理课占2课时;中学堂的课时安排与高校学堂相同。”<sup>[8]</sup>

从以上“癸卯学制”中有关地理教育的目的、内容等规定中可以看出,清末在新式中小学校教育教学中渗入了海洋教育内容,即在教学中让学生掌握中外地理知识,培养其爱国心的基础上,又开阔学生视野,让学生具有一定的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和海洋意识。如在小学中,让学生知悉“五洲之简图、地球表面及人类生计之情状、大洋五洲五带之区别”<sup>[11]</sup>,并创设悬挂“中国图、东西半球图、五洲图”于教室墙壁上的教学环境。在中学中,“使知地球表面形状、气候、人种及人民生计等事之大概;使知亚洲、欧洲、美洲、大洋州诸国地势;使知地球与天体之关系,并地球结构及水陆气象之要略。”<sup>[12]</sup>整个内容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涉及众多的海洋知识。

### 三、民国初期中小学教育中孕育而生的海洋教育内容

中华民国建立后,民国政府相继颁发了一系列学校令,改革“癸卯学制”,推行“壬子-癸

丑学制”，该学制明确规定了各级学校的教育宗旨、课程和修业年限等。涉及中小学地理教育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地理课教育目的。在高等小学校中，地理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儿童简要知道地球表面的情况及人类生活的状态，了解本国地理的大致情况，从而养成奋发爱国的精神。地理课程首先应教授自己国家的地势、气候、区划、都会、物产及交通等内容，以及地球的形状与地球运动的知识。在此基础上，再讲授五大洲的地理情况，同时要介绍全球重要国家的都会、物产情况。对于地理课的教学方法，也有相应的表述，即“教授地理，务须实地观察，示以地图、标本、影片、地球仪等物，使具有确实之知识，尤宜与历史理科所授事项联络，并使儿童填注暗射地图及习绘地图。”<sup>[8]</sup>到了中学校，地理课程要使学生知晓地球的形状及运动规律，同时应教授地表知识与人类生活的情形与状态以及各国国情。在此基础上，应讲授世界地理的概况，本国地理以及与本国有重要关系的国家的地理状况。

第二，地理教育主要内容与课时安排。在高等小学校三年的课程安排中，只讲授本国地理的内容，不涉及外国地理内容。高等小学校“每周课程共30课时，历史地理共占3课时，地理课为1.5课时。”<sup>[11]</sup>中学阶段，第一年学生主要学习地理概论和本国地理，第二年讲授本国地理及外国地理，第三年讲授外国地理，第四年讲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概论。中学堂“各学科每周课时33-35不等，其中地理科每周2课时。”<sup>[8]</sup>

1922年，国民政府颁布了壬戌学制。1923年颁布的《中小学课程标准刚要》中规定，“小学课程分为国语、算数、卫生、公民、历史、地理等十一科目，其中，卫生、公民、历史和地理合成社会科。”<sup>[13]</sup>中学阶段，分为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两个部分。初级中学课程，分为社会科、言文科、自然科、艺术科、体育科六科，地理课程包含在社会科中。当时的中学课程采用学分制，“各科学分总计为164学分，地理课程为8学分。”<sup>[13]</sup>高级中学阶段，地理为选修科目。壬戌学制时期，《中小学课程标准刚要》规定，“地

理课程应介绍地球的构造、大陆与海洋的位置、水面形成的原理、水道的分布以及世界主要大国的发展情况等。”<sup>[11]</sup>

总之，民国初期的中小学地理课教学中，课程体系更加全面与规范，在涉及地球的形状与运动、各洲地志之梗概、海洋气象等世界地理内容的教学中，都会有海洋知识的教授与学习，况且，在观察法等教法的运用中，向学生“示以地图、标本、影片、地球仪等物”“使儿童填注暗射地图及习绘地图”等，都会使学生习得一些基本的海洋知识。特别是壬戌学制颁布以后，在地理课程中对地球构造、大陆位置、水面形成及水道分布等内容的讲授都有详尽的规定，地理课程渗入的海洋知识的内容更为显著。

综上，在晚清教会学校、新式学堂与民国初期的中小学地理课教学中萌生了海洋教育现象与具体活动，三条线索清晰可见。虽然那时的海洋教育与我们当代中小学海洋教育在性质、形态、内容与方式上存在不同，但它们是中小学海洋教育的源头活水。追溯其历史，我国中小学海洋教育的起源就不仅仅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据此，可再上溯近150年，这具有始发意义和历史价值。

#### 参考文献

- [1] 马勇. 何谓海洋教育——人海关系视角的确认[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6): 35-39.
- [2] 胡瑞琴. 晚清传教士与科举制度变革[J]. 世纪桥, 2006(9): 76-78.
- [3] 杨齐福. 教会学校的兴起与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J]. 扬州大学学报: 高教研究版, 2000(1): 37-41.
- [4] 张传燧. 中国教育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316.
- [5] 吴洪成, 丁倩. 试论近代中国的教会中学教育[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7(1): 21-31.
- [6] 张佳静, 侯甬坚. 中国近代高等地理教育的萌发期初探(1862-1904)[J]. 高等理科教育, 2009(3): 26-29.
- [7] 吴小鸥. 晚清西式教科书的引进[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08, 7(6): 22-26.
- [8] 范连生. 清末民初的中小学地理教育探析[J]. 凯里

- 学院学报, 2008(1): 83-87.
- [9] 朱有瓛.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一辑(上册)[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 71-72.
- [10]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中册[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416-520.
- [11] 陈尔寿, 吴履平. 建国前的中小学地理课程[J]. 课程·教材·教法, 1988(6): 57-59, 64.
- [12] 张小宝. 我国中学地理教学目的之变革[J]. 中学地理教学参考, 2001(4): 9-11.
- [13] 陈青之. 中国教育史: 下[M]. 长沙: 岳麓书社出版社, 2010: 692-693.

##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Marine Education in China'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MA Yong<sup>1</sup>, LIU Kai<sup>2</sup>

(1.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ine education in China'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as its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prerequisites for social change. Dating back to its early stage, it originated mainly from the church schools run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after the Opium War, the new schools founded by the Westernization Group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stablished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ost of the maritim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the early emerging stage were embodied in geography courses and teaching, including textbook compilation, course content arrangement and specific activities. From the church schools and the new schoo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factors and contents of marine education had gradually been enriched, being the major origins of marine education in China'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Key word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marine education; geography course; origin

(责任编辑 赵 蔚)